■ 作者心语

昨天的脚印

——写在《考古践思录》出版之际

白云翔

我的《考古践思录》一书,历经近两年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出版,最近跟读者见面了。本书从确定整理前的犹豫不决到整理过程中的"心潮澎湃",从看到出版物后的忐忑不安到得到师友们肯定后的心情释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多变的心路历程。

一

关于整理本书的缘起和想法,我在《导语》和《后记》中已有所交代,这里再稍作补充说明。2024年春节前后,多位长期共事过的中青年朋友曾建言:希望2025年在我年届古稀、同时也是考古50年之际,以适当的方式回顾和总结我的治学之路。其中,一位与我同事多年、多有交往的朋友还直接劝我说:将你这么多年来在一些学术活动中的言论和其他一些非学术性研究论文的文字汇集成书,就是一种很好的回顾,也是学界所需要的。

我很感激朋友们的美意,但又迟迟犹豫不决。后来之所以决定做这件事,主要是这样的考虑。我作为一名考古老兵,先是做田野考古,后来转做学术期刊编辑并办刊物,再后来又是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双肩挑"20年,2016年从所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专事科研和教学,考古生涯有一定的"特殊性","虽无多少治学经验,但治学之路还是值得回顾和总结的……每个人走过的路不同,回望治学之路的方式也可有所不同"(第486页)。将近30年来的所做、所思、所言之一部分辑录成书,"不仅仅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一种记录,也是学界学术活动的一种记录"(第487页)——尽管只是沧海一粟,但或许是有益的。

正当我犹豫不决之时,读书的一些困惑促使我下决心做这件事。当时,我在阅读一些有关我国现代考古学史的著作和学者访谈录、回忆录时发现,有的对近五十年来考古界的一些重要学术活动、事件和著述,要么轻描淡写,要么避而不谈;对有些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并不真实全面,评价也并不客观公允——这当然是在我看来,但毕竟我是这些人和事的见证者。这是有意取舍呢,还是因无知而为呢?学术史也是历史,需要客观、真实的记录。这就使我想起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84年在其名著《乡土中国》再版时的《重刊序言》中说的话:他之所以同意37年前初版的《乡土中国》再版,"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对此我非常推崇。一个人走过的路是无法改变的,踏下的脚印——无论是正还是斜,也无论是深还是浅,都是收不回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客观记录下来是必要的。

二

本书分为三部分,共收录言论和文字90篇——尽管都具有学术性,但不包括学术性研究论文,另加5篇"附录"和文前一万余言的《导语》。第一部分是"言论篇",选取收录笔者作为供职单位和学术社团负责人在有关学术活动中的致辞、讲话和总结等23篇;第二部分是"书序篇",收录迄今所作书序19篇,包括"自序"1篇和"他序"18篇;第三部分"泛议篇",选取收录1992年以来的言论和文字48篇,包括因应学术发展、学术热点和社会关切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与考古学和文化遗产有关的文章,以学者个体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的发言、致辞、总结、点评和笔谈等。其中,大多已见于书报刊和网络。每篇都写有简要的题注,以说明其背景。这些言论和文字尽管都是笔者所言所写,是昨天的"脚印",但它们又是学界的历史"印记"。

这些都是个人的"脚印",但它们又都是在学界师友的扶持下踏出来的。譬如,书中关于香港考古的3篇文字(第249~260页),都离不开香港中文大学邓聪先生的热情帮助,既有1991年春笔者初次到香港考察时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也有1993年春应邀参加香港马湾岛扒头鼓遗址的田野发掘,并且其中一篇是我们二人合作撰写的。又如,书中有2篇涉及我的著作《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一篇是该书的《日文版序》(第137~139页),另一篇是该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后在颁奖大会上代表获奖者的发言《获奖感言》(第345~347页)。当我整理这两篇时,可以说浮想联翩:我想到了该书撰写过程中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刘庆柱先生、人事处刘凤瀛处长等的大力支持,想到了栾丰实教授的精心指导以及山东大学考古系诸位师友的多方关照,想到了李淼、刘方、施劲松、杨晖、陆志红等同事周末帮助笔者编排插图、查找和复印资料等;想到了该书2004年申请出版资助经费受到阻挠时,刘庆柱所长等秉公决策,与他人同等享受出版资助;想到了资助经费仍然不足时,栾丰实教授慷慨襄助;想到了科学出版社闫向东、宋小军同志不计经费有限、冒着销售前景不明的风险毅然接受编辑出版……没有众人的襄助,就没有该书的面世,也没有日文版的翻译出版——"新世纪以来日本学术界首次全文翻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著作",更谈不上获奖。

这些都是个人的"脚印",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学界众人一起踏出来的。譬如,《中国前期新石器文化研究取得新进展》一文(第3~6页),是1998年6月18日在"中国前期新石器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会议总结要点。这次会议作为考古杂志社成立后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领导任式楠、张显清等5人全部到会坐镇,来自全国的近60名专家学者参会。每当忆及此会,忘不了安志敏、石兴邦、张忠培、谢端琚4位先生主持发言讨论时的聚精会神和精彩点评,忘不了石兴邦先生在闭幕式上发言时激动地流泪……(《考古》1998年第10期)。又如,《新世纪我国考古成就缩影及发展动向》(第7~27页)是笔者2003年至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即"六大考古发现")上的总结摘要集录。这个论坛是全国考古界一起打造的: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始终高度重视和支持,历届论坛的开幕式上,都有双方领导出席并讲话;全国考古界都积极申报参选;众多媒体踊跃参会报道;考古杂志社全体人马齐上阵更是自不待言……很显然,没有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全国考古界的支持,我的这些"脚印"是留不下来的。

这些都是个人的"脚印",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学界的历史"印记",因为,这些言论和文字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所言所写,并且是"有的放矢"的。譬如,世纪之交前后,学界在关于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争论,甚至有一种声音:大遗址尤其是"国保"单位,能不挖就不挖,能少挖就不多挖。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2002年发表了《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一文(第277~282页),讨论了两者的关系并指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是大遗址保护的基础。"后来,又对此进一步思考,认识也进一步深化,2024年9月21日在《汉代海昏侯国考古进展与考古工作者的使命》的致辞中(第126~133页)提出:"强化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意识,自觉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是新时代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又如,针对近年来学界不少人在如何理解和处理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阐释之间的关系上的困惑,我在2024年写的《师宗大园子墓地·序》中简要阐述了对考古学学理特征的认识,进而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田野考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阐释,以及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第223~230页)

三

这本小书出版后,中国考古网曾于10月9日推送了本书的《导语》(节录)和《后记》;近两个月来,也陆陆续续收到不少读者的反馈信息。其中一位青年朋友说,"五十年考古生涯的见证,令人感慨、钦佩、鼓舞、遐思";一位中年学者说,"这本书,学术意义远大于一般的学术著作,至少我是这样看的";一位师长说,"粗略拜读了一遍,内容丰富,且多是考古理论方法及研究方向等方面的重要论述,非常有用";另一位师长说,"我用一个小时从头到尾翻阅了一下,真的不错。这些篇幅小一点的文章不集合起来,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曾经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些事情"……对于师长和朋友们的肯定和鼓励,笔者心存感激,同时也感到辑录出版这本书还是有意义的。说到这里,还要回过头来再次感谢两年前"怂恿"我做这件事的几位青年朋友们。

这些脚印,当然不是我考古生涯的全部,况且"作为学术史的一种别样'记录',我深知,这种记录对于我国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学史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历史的、具体的、客观的、真实的"——无论书中所言是对的还是错的,抑或是真知灼见和谬误兼有之。昨天的脚印,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学术史亦然。"学术是神圣的。作为一个从事学术之人,对学术有一颗敬畏之心,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考古践思录》
作者:白云翔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一同探索古船之谜

——"长江口二号古船发现与研究丛书"序

褚晓波

2022年11月21日0时40分,上海崇明北港水域,长江口二号古船(以下简称"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出水,世界首创的"非接触弧形梁整体打捞"技术取得圆满成功;11月25日13时30分,杨浦上海船厂旧址一号船坞,世界首艘文物打捞工程船"奋力"轮"怀抱"长江口二号进坞落座。至此,全球首个水下考古调查、整体打捞迁移、博物馆选址同步实施的水下考古项目取得巨大成功,古船从此摆脱了被长江水流冲毁的宿命。长江口二号"回家"的新闻受到广泛关注,《新闻联播》先后3次播报,央视新闻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进行了全球直播,中文、英文、法文、阿拉伯文、日文、韩文、俄文等主要报刊均做了大量追踪报道,并最终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从2015年9月主动调查发现船体,到整体打捞迁移成功,长江口二号"回家"旅途走了整整8年。其间,为确保遗址安全,工作团队严守项目信息、时刻看护遗址现场。为破解浑浊水域水下考古难题,考古机构与高校、科研院所,精诚合作、跨界攻关、研发装备,率先开启智能化水下考古技术的探索,作为成果的"机器人水下考古装备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2017年"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为减少水下作业时间,确保长江口二号出水迁移过程万无一失,打捞机构采用了先进的精密加工设备,创新性应用弧形梁曲线管幕、智能打捞监控系统、大吨位同步提升系统,打捞方案经过严密理论计算、缩尺模型试验与等比例海上试验,不断完善施工技术和工艺。长江口二号遗址整体迁移、异地保护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新的中国模式,贡献了上海方案。

长江口二号残长38.1米,是目前国内发现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古船,填补了清代同治时期木质贸易帆船的空白,是近年来中国重要的水下考古发现。船上装载的大量瓷器、紫砂器、煤炭、金属工具等船货和船上用品,共同构成了同治时期沉船出水物质遗存的"标准组合",是历史馈赠给今天珍贵的"时间胶囊",具有重要考古和学术价值。清晚期咸丰、同治年间,上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港的翘楚。江海交汇、南北海岸线中点的地理位置,大大便利了贸易物资的江海联运、南北转运和远洋航运。以上海为中心的航运网络,遍及东部沿海城市,深入长江腹地,广及欧美大陆,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奠定了近代中国经济文化地理新格局,影响及今。长江口二号是上海成为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初期木帆船贸易与航运的实物见证,历史价值非凡。

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长江口二号相关工作。长江口二号沉船项目已作为中国水下考古重大项目列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保护和展示长江口二号的博物馆被列入2021年1月发布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长江口二号考古与文物保护是攻坚克难的漫漫征程,尚存诸多谜团有待解决,还面临着脆弱船体支撑加固、饱水木材与铁钉复合材质船体的文物保护等难题。为此,我们首次提出以"长江口二号全生命周期"研究为目标,综合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和丰富的历史文献,复原长江口二号从设计、建造、航行、沉没、埋藏直到被发现的全过程。

在长江口二号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过程中,我们筹划出版"长江口二号古船发现与研究丛书",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与大家一同探索古船之谜,及时接受大家的批评建议。本丛书的定位是全方位和开放性的,不仅包括考古研究、文物保护成果,而且将汇集相关工作和研究成果,共同构建长江口二号知识库;探索综合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和丰富文献资源研究、展示近代贸易木帆船的方法,力求以世界眼光、上海视野,探索以上海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塑造古船水下考古研究的全新范式,让长江口二号的考古、研究、保护、利用和传承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水下考古的窗口,讲述上海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可观可感的历史。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标题为编者所拟)

《古船弧光》
编者:上海博物馆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作者:周东荣 朱小东 褚晓波 翟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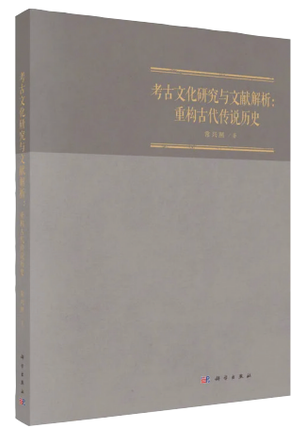
《上海长江口二号古船》
编著:上海博物馆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作者:翟杨 褚晓波 赵荦 黄翔 葛彦 朱小东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 学者导读

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评《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

许永杰



商代晚期刻辞甲骨的发现,让人们得知安阳小屯就是商代晚期的都城。受此激励,考古人更期待确认西周中期豳公盨记录的夏禹的遗存,乃至战国齐侯因资镦提到的黄帝的遗存。将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与考古学的发现整合,以重构古代传说历史是治古史者和考古人共同的学术追求。《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下文简称《重构》)就是这样一部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整合研究的著作。

成功地做成这样的整合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扎实的考古学和文献史学的功底。常兴照先生1978年初入学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随张忠培教授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毕业后在《岱海考古》编辑部工作期间,受王树明先生熏陶,致力传说时代的古史研究。《重构》收录的《论五村类型》是一篇纯粹的考古学研究文章,该文从分析五村类型的5处典型遗址的文化因素入手,建立分期,归纳分布,探讨源流,比较与周邻文化的关系,对大汶口文化晚期分布在潍淄流域的五村类型做出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其认识和结论令人信服。《重构》收录的关于《少昊、帝舜与大汶口文化》之《少昊、太昊、帝舜传说疏证》部分是一篇纯粹的文献考据之作,其中关于太昊与帝喾的关系论证,首先引《易·系辞下》《竹书纪年》《新语》等文献记载,归纳出太昊是天文历法、罔罟畋渔、文字契刻、音乐丝竹、人伦法理的创造者;进而从文字学的角度指出喾、告、皓、浩、嚗等字古文皆通;又引《国语·鲁语上》《吕氏春秋·仲夏纪》等文献记载,归纳出帝喾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作歌制乐,其功德与太昊相同,遂判定太昊与帝喾实乃一人,其说有凭。

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学人们发现若以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结合重构传说时代的历史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考古学发现与古史传说的整合研究有两个瓶颈,一个是两者的年代难以对应,因为传说时代尚未产生成熟的历法;一个是两者的研究材料无法直接对话,我讲我的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你讲你的黄帝、少昊。面对这样的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能够把古史传说中的帝王或部族与考古学文化对应,便有望突破整合研究的两个瓶颈。《重构》就是选择的这一突破口,书中关于两者的对应关系处处可见,诸如:老官台—半坡—庙底沟文化系统是黄帝文化,贾湖、裴李岗、磁山—北辛、后冈文化系统是炎帝文化。汶泗流域的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是蚩尤部族的物质文化,后冈遗址很可能就是蚩尤逐帝(榆罔)自立之后建立的根据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应该属于三苗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与石家河文化,应该属于南蛮文化。以郑州大河村三、四期遗存为代表的秦王寨文化,有可能代表早期共工氏的物质文化;新发现的双槐树遗址,可能就是共工氏的都邑。豫北冀南地区的大司空文化,应该是颛顼部族的物质文化。鲁西豫东地区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部分早期遗存,应属夏鲧部族的物质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桐林类型是后羿部族的物质文化;河南新砦遗址晚期遗存,可能是后羿代夏形成的史迹。乃至,帝喾娶上妃姜嫄氏,生子后稷,指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关系;次妃有娀氏,生子帝契,实为介入了后冈二期文化的发展;再次妃陈隆氏,生子帝尧,为对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类型的渗透;末妃娵訾氏,生子帝挚,是指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晚期遗存。能够把考古学文化与古帝王或部族对应得如此之多、如此之细者,放眼学界仅《重构》一书而已。

常兴照在两者对应关系研判的基础上,构建了古代传说历史的体系构架:

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存在两大文化系统,即中上游的老官台—半坡—庙底沟系统,中下游的裴李岗、磁山—北辛—后冈—大汶口系统。这两大文化系统,相当于苏秉琦先生所讲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着面向海洋的使用炊器鼎的文化系统和面向内陆的使用水器尖底瓶的文化系统(《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与这两大文化系统对应的是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部族和黄帝部族,到后来则演变为昊族文化与夏族文化的对立,以及华夏东西(夷夏东西)的黄河流域三代以前的民族分布格局。

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五帝时代的定位是:后冈一期文化前后,是为传说时代早期,距今6500~57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中期和仰韶文化后期之际,是为传说时代中期,距今5700年~50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是为传说时代晚期,距今5000~4000年左右。具体到黄河流域的下游山东地区,古代文化存在三个高潮期:一是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二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三是龙山文化中晚期。三个文化高潮期基本可以对应炎黄、尧舜、后羿乱夏时期。

没有哪一种武功可以包打天下,没有哪一种良药可以包治百病。《重构》作者虽然也认为:"光靠考古学本身的方法和文献分析研究传说历史仍然不够全面、科学。还需要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解,在具体操作上往往受到材料的局限。《重构》的主要方法还是考古学和文献史学的相关方法。具体讲考古学的方法是寻找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变化节点——"碴口";文献史学的方法是文献的分析、对照——"拼接",用以确认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性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碴口有四个,第一个碴口是仰韶时代前期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碰撞与迁徙;第二个碴口是在安阳大司空类型、荥阳秦王寨、大汶口文化中期形成前后的阶段;第三个碴口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汶口晚期文化形成并发展为龙山文化的时期;第四个碴口是龙山文化中后期的变化。"拼接"体现在各个碴口中的相关文献的研究,如第二个碴口,北辛文化—后冈一期文化的蚩尤部族被庙底沟文化的黄帝部族击溃之后,山东地区形成了含有庙底沟文化花卉纹彩陶的大汶口文化,其代表的是少昊清部族,此即所谓"黄帝生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命少昊清司马鸟师"(《逸周书·尝麦解》)。综合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因素生成的大司空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存在较多的联系,大汶口文化中见有大司空文化式彩陶、釜形鼎、折腹盆等,此即"少昊孺帝颛顼"(《山海经·大荒东经》),"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帝王世纪》),大司空文化就是颛顼部族的物质文化。在大汶口文化壮大及西进的逼迫下,大司空文化龟缩至豫北冀南的狭小地域内,此即帝喾或虞幕接替颛顼,"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国语·鲁语上》)。

阅读《重构》一书,我们欣喜地发现常兴照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中还不乏颠覆式的观点,诸如:

五帝时代可上溯至前仰韶时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五帝时代比定为距今5000年至4000年间的龙山时代。苏秉琦认为,五帝的时代上限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中华文明起源与重建中国史前史》);严文明先生认为,太昊、少昊、蚩尤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相关,蚩尤与黄帝、炎帝的战争发生在这一时期,年代大约不超过距今5000年(《东夷文化的探索》);许顺湛先生认为,五帝时代的年代并不限于龙山时代,而是要上延至仰韶时代(《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次序主要有:《国语·鲁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易·系辞》的庖牺、神农、黄帝、尧、舜,《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世经》的少昊、颛顼、喾、尧、舜。

良渚文化为三苗文化,屈家岭文化为南蛮文化。地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虽然是中国史前时期的一支强势文化,但是与其相关的传说时代的古帝王或部族的研究却很少,只是陈雍先生在解读良渚文明时,讲良渚的水利设施与鲧障洪水的年代相当(《解读良渚文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及其研究路径》)。地处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相关的传说时代的古帝王或部族的研究以俞伟超先生的《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先导,俞先生认为,《战国策·魏策一》所记三苗的活动范围"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应在鄱阳湖与洞庭湖之间、伏牛山之南的长江中游,分布在区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是三苗部族的物质文化。

《重构》一书是作者相关文章的论文集,收录文集中的20篇文章,《少昊、帝舜与大汶口文化》《蚩尤辩证》等是我曾读过的业经发表的论文,《共工氏文化解析及其流徙辩证》《华族、华族文化与华夏关系考论》等是我新读到的未曾发表过的论文。论文集收录未曾发表的文章是我们学科的优良传统,邹衡先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收录有7篇文章,只有《论郑州》和《论殷墟》2篇是公开发表的;严文明先生《仰韶文化研究》收录有16篇文章,其中《从王湾看仰韶村》《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等6篇是未曾发表过的。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位为学术而学术的真学者。

业师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一书中讲:"我本着认识真实的历史的追求,走上了从考古学追求真实历史之路。这路曲折、崎岖,到头来,我才醒悟人们只能接近真实的历史。"几代学人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整合研究,在古代传说与史前考古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诸如:庙底沟文化是黄帝部族的物质文化、后冈一期文化与蚩尤部族相联系、大汶口文化与少昊部族相联系、王湾三期文化是夏文化的前身等。还有更多的问题一时还难以形成共识,甚至永远不能完整地构建传说时代的历史,永远不能真实地再现传说时代的情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朝着历史的真实走去。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

《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
作者:常兴照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